

植物园入遗的多重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上周六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会议上支持并赞同将新加坡植物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植物园成为我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第三个入遗的植物园，加入伦敦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及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Orto Botanico）行列，也是世界首个得到这份殊荣的热带植物园。

占地74公顷，拥有156年历史的新加坡植物园申遗成功，为我国欢庆独立50周年献上一份大礼，这个跨越三个世纪的植物园，见证了我们一段以橡胶种植为经济命脉的历史，植物园后来肩负的任务扩大到培育花草树木，帮助我国在都市化过程中处处保存绿肺，就如李显龙总理得知申遗成功后在面簿网页上所说，植物园在帮助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装饰园艺领域栽培

了很多园艺家。

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用驳船码头的土地向商人胡亚基换来22.4公顷位于东陵的土地，并授予农业园艺学会以打造植物园。1877年，从英国皇家植物园运来第一批橡胶树种子，在植物园试种、研究。种植试验成功后，橡胶在马来亚推广和大量种植，并使马来亚成为世界天然胶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跟着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开始了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植物园因此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是新加坡植物园在申遗评估中获得重视的一个重要理由，而植物园具有历史悠久的人文价值，曾经见证历史发展重要阶段的园林景观，以及它在我国城市规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我国去年1月获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名，并在今年5月中旬对植物园作出肯定和举荐，最终申遗得以成功的关键。

社论

2015年7月6日

键。出席在波恩召开会议的代
表均给予新加坡植物园最高赞
誉，称它是“非常杰出，具有
普世价值”的园林。

举凡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都会以入遗作为吸引旅客的号召，同在2008年7月7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每年7月都会为入遗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乔治市入遗七周年庆典这几天正在举行。新加坡植物园入遗，肯定能为我国的旅游业加分，国家公园局为庆祝这个大家热切期盼的结果，从这个月起将举办全民欢庆的系列活动，包括本月10日开始举办总数1万6000株胡姬花的“植物灵感”展览，接下来到今年11月，每个月至少会有一个周末举办音乐会等表演。

植物园不像其他收费的旅游景点，它所肩负的价值和使命不同于两座综合度假胜地、新加坡动物园、夜间野生动物园、河川生态园、圣淘沙等植

物园的存在充分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这座在城市国家中独特的园林，背后有许多建国过程中展现的明确概念和所坚持的理念，它不是金钱堆砌的产物，价值也无法以金钱来衡量。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昨早在三巴旺集选区的国庆庆祝活动中受访指出，除了植物园，新加坡能呈现给世界的还有很多，他抛出了一个话题：我国的下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在哪里，这的确值得国人一起思考。

国家公园局和国家文物局未来将落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出的植物园可持续发展五大建议：加强四周建筑管制，确保现代建筑远离园区视线；加强保护园内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区的“缓冲地带”；改进历史建筑的保留和监控访客的人数，以及制定明确植物保育管理目标等。我们必须继续投注心思和资源，确保植物园永远成为新加坡的骄傲，而你我都负有责任去细心呵护这个已赢得世人艳羡的目光，甚至以为世人所“拥有”的珍贵文化遗产。

思维空间

周雷

跨越世界格局变迁的“1500之讖”

1500年，地理大发现的年代，这个时期的跨洋航行和“精神出海”，造就了西方文明的“跨河入海”时代，也造就了西方持续500多年的不断崛起和文化勃发，形成了一次人为地理造山运动，因此也奠定现有的世界格局。

这个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一味沉沦，它有自己的文化振作和命运反思，叩问代际之变的生存之道，但是从格局和气象来说，似乎东方文明的气数尽了。应该说可以，伴随着西方文明的持续扩张和开枝散叶，东方“失落了”，如今几乎所有东方文明的发源地，都经历着文明坍塌的痛苦。

不仅过去的荣光不再，故土崩摧，精神离散，即使是追忆荣光的线索都断了。在这个意义上的东西方以及东方文化内部，彼此的隔离就像地理板块构造学说中的大陆漂移，各种连接大陆的大陆桥都中断了，许多因而成为历史之岛，东方支离破碎成无数细小的碎块。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一个范式的命题，也就是1500年前——包括1500年至1800的震荡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范型依靠的是一种山水与河山体制，中国语言中的江山社稷，以山、水、土地祭祀、谷物崇拜，将东土的基本抽象山、水，以及这个地理架构上的风物，看成一个连绵的文化和政治整体。

道教中有一种五岳真形图，这种把三山五岳看成一种母源和渊数的认知和想象，基本将山岳看成神秘力量，族群繁衍，文化传播的核心之核心，它是文化绵延的命运所在；印度教、藏族苯教、佛教也将冈仁波齐视为众山之祖，所有繁殖力的源泉，也就是凯拉萨山（Kalashi）。

古代的中国人，如果要寻求神的庇佑或神的垂青，他们需要通过祭拜和封禅神山来获得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根基。中国的土地之上，基本上按照山体 and 山系，形成了不同的治理集团和文化区位，山水成为中国的文化之魂、精神之灵；山水可具象，亦可抽象，至今我们仍能从淡淡水墨中的模糊简奥山水意象中，看到最具中国人特质的精神栖居。

这个角度看《山海经》，它是经纪山河，规范天下的山水体《圣经》，是具有文化元典意义的创制和运筹；也因此奠定了中国居于山，游于水，依于土的山水型政治和文化型制。古人建造九鼎，代指九州；商人造青铜，用一种青黑收聚的材料来象征生命杳冥，同样是一种山川包笼的型制暗示。这时候的铭文刻制，可视为一种与青铜山水象征的土地之上，与天地神灵的沟通，星裂开片的文，最重要不是传达和沟通意义，而是成为一种借抽象抵达具象的无远弗届的“媒介脐力”，命运得以永年，山水得以永享。

这个漫长的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海洋是一种背景性、中介性、状态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不存在生活在海洋里的人；海洋是想象的边界，是人与世界的流动性边界，一如人胚胎孕育时期的“羊水”，混漉之下，人得以抱一而成形。

在这方面，1500年崛起的“西方人”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山水和海洋认知图式，对于海洋他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研究和分析，无论是使用简陋的北欧维京船，还是无敌舰队，或是各种西方探索发现号式的舰船模型。西方人似乎更系统化按照人类探索外太空的方式，探

索了海洋的秘密，并从海洋寻求元典和制定范式的可。也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得以通过海水作为中介，它弥散了整个大陆，同时见证了这些山地之国，河流之邦的崩溃和陨落。

这种山/水与洋/山互动模式，造就了两个文化地理和世界格局形态，也形成了中国在发展自身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之谱。在洋/山互动模式之下，西方海洋型文明扩张全球的时代，山麓和河川式文明几乎没有抵抗能力。“西方”的崛起还原了一次早期生物进化的模式——从海洋的相对低等形态的生物，逐渐上岸，变成两栖型动物，西方也成了两栖型文明。而对于“旱地”生长繁育的“东方”文明来说，他们对于海洋来说是畏缩和抗拒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指向未来的进化是从陆地升入天空，中国人把海洋幻化成氤氲流变的气象，并把最具神性的事物，放进仰头可见的上苍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一种“东方”文明，它的崛起和自身跨越，不仅是要回望山麓和河山，更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海洋能力，特别是海洋型风水观念，将这个流动、混漉、飘摇的水体，看成一个“液态的大陆”，构造自己的海上精神山水和海上未来之城。中国的未来进化，钥匙不仅依靠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海域作为一种认知对象，它与山水型制最大的不同是流动、模糊和抽象性，它边不清，界不明。水体永远在交换，界限被抽象成一个流动的动态。如果说人不可能同一次踏进一条河流的话，海洋时代的界域观是——人一次也不可能游弋于一



特约漫画 王锦松

静止的海水。

创造中国海洋时代

出现在3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海之海水，它在片刻之间和须臾之间，成为安达曼海的海水，进入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太平洋。因此，我们从文明范式转型的意义上，可以把中国看成“西中国”（山河社稷型旧中国）和东中国（洋/山互动型海洋新中国）；站在中国漫长东部海岸线之上，西望是中国河山祖脉，东望是中国洋山风水未来。

以此观念进入治理层面，中国需要回应“西中国”的中国文明内部的遗产和延续——那是出现在东

方文明内部的西方文明；更重要的是回应“东中国”的“创世纪”肇制，创造出东中国的海洋时代。

中国人因此也需要依据海洋与陆地交互的两栖型智慧：海水与能源，海洋居住形态，海洋的生产和再生产，海洋生命的共同体，海洋的精神向度。这一切的基础始于中国人如何解决因为中国文明在“河山时期”过度发展，而造成的海洋生态剧烈退化的现实。

这些讨论，不仅关涉中国，也是任何一个东方文明需要解决的未来自题，从亚述人的山谷，两河文明的腹地，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宗教政治圈，南中国的东南亚政治集团，到南美的玛雅文化圈和非洲的

古内陆文明及海洋文明早期子遗。

这个围绕河山到海洋转型的文明和族群命题，是真正可以将东方文明团聚在一起的真正核心，它可以超越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神道教等宗教的认知禁锢和观念自我束缚。

借用中国长江之尾，大河入海处的一个地名——上海洋山，中国的未来至少有一种表述：东临洋山，以观沧海；河山回望，东西和同。中国文明出山麓，乘桴浮海，用西方人的话来说，那是中国人的《出中国纪》，也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破题意义。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审时度势

比尔·艾默特

安倍晋三“重返”亚洲

过去一年，东亚三大最成功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改进。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三个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从未是顺利和容易的。20世纪的历史和它们长期的敌对关系，造就了现在的状况。

今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重大演讲。他的说话要么将加速和解，要么将结束和解进程。鉴于他的右翼血统和对日本侵略史的修正主义看法，区域已准备面对他的演讲将引发的新一轮外交动荡。

安倍不应该忘记，他有能力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虽然根本不发表讲话可能是最明智的对策，他仍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巩固日本作为亚洲积极力量的国家形象。他应当向世界证明，日本是一个展望未来、而非纠结于过去的大国，日本也希望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亚洲。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后，东京主要通过遍布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慷慨海外援助，来体现对其侵略史的救赎。安倍应当把这种慷慨的精神和行动，作为他讲话的核心内容。

慷慨的力量可以熄灭怒火。2007年，我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大部分展品所表达的情绪，都浓缩在它的名称中。因此，看到最后一件展品，是对日本数十年来对中国的援助和投资表示感谢的展览墙时，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惊喜。

上个月，安倍宣布日本未来五年将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1100亿美元的计划时，也可能反映了上述思路。问题在于宣布的时间点。美国和日本都犯下了拒绝加入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错误。它们甚至还批评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内的50多个选择加入的国家。

这一立场让美、日陷入孤立并显得无礼。对日本而

言，这还使其上个月的投资宣布，看起来像是针对亚投行的反击——1100亿美元的投资，也超过该行的1000亿美元初始投资。

安倍若试图利用演讲来安抚右翼支持者，将进一步损害区域对日本的看法。如果他回避就日本二战期间所作所为公开道歉，或对日本罪行的批评表示质疑——如日本皇军性奴役韩国“慰安妇”，尤其会激怒中国与韩国。

相反的，安倍应该仿效他4月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他在参观二战死难美国老兵纪念馆时，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深深忏悔”和对死难者的永恒悼念。

但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问题上，安倍只承诺“维持前任首相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而拒绝重复实际的道歉内容。今年8月，安倍应该重申并超越前任首相的声明。类似对美国战争死难者使用的措辞，能够表明日本并不打算改写历史，而且安倍不仅在美国盟友，也在亚洲邻国面前表示忏悔。

宣布日本准备采取慷慨和建设性的立场，安倍将有机会从过去过渡到未来。他可以谈谈他希望协助建立的亚洲秩序，并提出他认为必要的区域机构。

一个抢占先机的方法，是在日本战后建立的现有和平计划的基础上，就亚洲防务和安全问题提出一项包容性计划。计划不仅包括与韩美两国，也包括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演和信息共享安排。

这样的计划可能最终因过于激进而无法实现；毕竟，它需要克服亚洲真实存在的分歧。但作为对和平及美好未来的姿态，它无疑可以让日本占据道德制高点。而这恰恰应该是日本的目标。

作者Bill Emmott是《经济学人》杂志前主编
新纪录片《欧洲大灾难》的执行制片人
英文原稿：Shinzo Abe's Pivot To Asia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5

谈古论今

刘家明

又一个诡奇的历史巧合

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每年都会举行“香格里拉对话”，讨论安全问题。今年的热门议题无疑是南中国海纠纷，以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领海、领土”争议。

美国的加入和近日同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的近距离“擦身”而过后，更为事件增添了变数，让大局显得异常复杂。李显龙总理在致词中指出，中美如果持续博弈的话，只会引发更多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危害整个东南亚的发展。东南亚多国部长也提议，通过谈判制订行为准则，以和平与双赢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

这不禁使我想起历史上的第一个海洋公约的讨论，它和新加坡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可说是历史上的一个诡奇巧合。

在17世纪，南中国海和东南亚的海域和香料贸易，完全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欧洲殖民国所垄断。由于还有一条名存实亡的“教皇子午线”的协议，两个海洋大国基本上还没有大的纠纷，倒是后起的荷兰为了要分一杯羹，就不得不耍手段了。1603年2月25日，荷兰人通过柔佛王朝的暗中协助，在新加坡外海截获了葡萄牙商船“圣塔·卡塔尼娜”号（Santa Catarina），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在西方历史记载里出现。

这商船里的瓷器，香料等货物的价值，据说几乎是整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总值的一半以上，所以整个掠夺行动也受到荷兰国王的包庇。葡萄牙向教皇皇庭申诉不得直，于是动用海军和舰队封锁柔佛海峡和新加坡海域，一直到了当年的10月，荷兰海军才开始突围。

根据特欧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所刻制的地图和记录，葡、荷在10月初开战，第三战也是最后一战在1603年10月10日的樟宜外海、白礁和峇淡岛之间的海域发生，最后以葡萄牙海军战败告终。记录里也在几处提到柔佛苏丹的间接参与，否则刚到东南亚而人“海”生疏的荷兰海军，肯定占不了葡萄牙海军的便宜。毕竟葡萄牙早在1511年就占领马六甲，且在东南亚海域活动了近100年，对此地区的海域非常熟悉，占尽先机。

这场海战在西方航海历史中称为“樟宜海战”（Naval Battle of Changi），是一场非常重要和有历史意义的海战。德·布里在这场海战刻画的地图，在图里标出了各个地名，Sinca Pora在地图里出现。这也说明了新加坡在17世纪就开始在这里的海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只不过那主要是航海的需要，所以只详细记录沿海的地标而没有内陆的叙述。

经过了“樟宜海战”，欧洲各国的政治界和商界开始注意海上贸易所引起的各类利益上的争议和诉讼，于是促成了各种所谓海洋法或公约的讨论和制订，并以欧洲殖民者的价值观和利益瓜分世界。这些公约、法则在当时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却影响深远，有许多当时的原则和理论，都成为几百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

没想到400多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又再“卷入”一场国际性的海洋纠纷里。我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南中国海的安全和稳定，却大大影响着我国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是电子工程师